

刘伯承观瞻“三绝碑”

阎 殿 卿

一九四八年秋，刚刚获得解放才有几个月的临颖县显得
格外平静与安定。有一天下午三时许，天下着蒙蒙细雨，临
颖县西北隅的古镇繁城，街上行人全无，往日满街的尘土也
被雨点润湿，空气显得更加清新洁净。在南北走向的清真寺
街路西，有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小伙子，光着脊梁，站在自
家大门前的一棵小槐树下，悠闲地观望着这清静的街道。这
条穿过古镇的长街是一条通衢大道，北上许昌，南到舞阳，
是过往行人的必由之路。

这时，从长街北头，驶进一辆布罩顶的吉普车。这显然
是一辆军车，车上坐的不是一般的人。站在树下的青年两眼
望着驶过来的汽车，他神情自若，一丝也没有象过去见到国
民党士兵那种恐慌的神态。汽车驶到青年人跟前慢慢停了下
来。车后面的帆布门打开了，从车上下下来一位白须飘飘的老
者，他个子不很高，头戴一顶帽衬，身穿丝绸长衫，外罩一
件绸坎肩，看上去约摸有六、七十岁的样子。老人向站在树
下的青年打招呼，他操着外地的口音，很和蔼地问：

“你叫什么名子？”

“张小拴。”青年回答。

“这里有个献帝庙？”

“有，就在南边，不远，近得很。”

“你带我们去好吗？”

青年欣然同意，爽快地答应了一声：“中！”

于是，名叫张小拴的青年登上驾驶室右侧门外的踏板上，用手扳着车门，指引着司机把车开上向汉献帝庙的路。

车内连司机共七个人，六个人是面对面坐在车厢两边的座位上。除老者之外，全是身着军装的军人，个子高大，很威武。其中一位军人戴着一副墨镜。

汽车在献帝庙前停下来，除司机之外，其余一行六人在青年的带领下进了庙，径直来到后大殿。大殿前有四侗盘龙大石碑，西边还有几块小石碑。他们把庙里凡能看到的石碑都看完了，然后向青年说：“小拴，‘三绝碑’在哪？”青年愕然：“就这么多，别的就没有了。”青年略加思考了一会儿，我去找个人问问。”

不一会儿，青年把看庙的孤老人肖歪子找了来。一行人在肖歪子的带领下又从后院走到前院。肖歪子指着一所小屋说：“‘三绝碑’就在这里头。”众人看去，只见那所屋子的门窗全都用砖垒住了，只有西间屋后有个二尺见方的小窗户用砖插着。肖歪子把砖一个一个地抽下来，墙上便出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大窟窿，他第一个钻了进去，其余的人也跟着钻了进去。屋内果然有两个高大的石碑。

这也难怪这个青年不知道。汉献帝庙在解放前夕是国民党的镇公所，小孩子谁会往那里去呢！

进了屋，只见五位军人和那位老者围着石碑前前后后仔细地看、谈论着。那位老者不停地指指划划，显然是一位行家。石碑背面，有几行字被凿成方坑，说是被人掏走了，掏的字有大有小。真没想到，竟会有人能在石碑上偷字。

从庙里出来，他们仍旧让青年作向导，去看受禅台。

受禅台不比受禅碑，这座高大的土坛，千百年来，一直安闲地蹲在繁城镇南门里边，是人们举目可见，繁城镇上妇孺皆知的。当然，这位青年张小拴也不例外，他小时候就经常爬到台上扒“炮药”，然后用香油调和，治过自己身上的脓包疥。平时还在台上刨出过汉代的铜“枪头”呢。

青年领着他们一行，在高大的土坛上转了一大圈，他们大概会谈论汉献帝刘协如何逊位给魏文帝曹丕的故事。过了好久，等到土坛的形貌和历史故事都留在他们的记忆中之后，才慢慢地走下受禅台。

吉普车载着一行人又在青年张小拴的家门口停了下来。老者又同青年商量，能否再领他们到许昌的圪塔村附近有个“三人冢”曹操挟天子至许昌后，又将三个太后也挟持了来。后来三个太后抑郁而死，葬于此。青年因不熟悉路径，谢绝了。

汽车开来了，朝着来时的方向驶去。青年仍旧站在门前的小槐树下，目送吉普车驶出了繁城镇。

事情过去约莫两个月的光景，有一天，看庙老人肖歪子在街上遇见青年张小拴，兴冲冲地劈头就问：“小拴，你知道那个戴墨镜是谁？——那就是刘伯承将军哪！”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日

（根据张小拴回忆整理）

幸会陈毅将军

舍学仁口述 阎殿卿整理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是我永生永世不会忘怀的日子，那是农历丁亥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正是这一天，有幸见了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陈毅将军。

临颖第一次解放是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解放军很快进驻繁城镇，我家附近住的就很多。国民党跑了，共产党来了，清真寺的气氛也变了。那些天，心里也不怙平静，解放军到底是个啥样的队伍过去我也没见过，说也说不来，以前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厉害，没见过解放军，听着就害怕。我虽然是九世阿訇，经过的事不算少，但对解放军的了解却不多。那些天来，看过他们张贴的布告，写的标语，听他们说话都很和气，才和他们有些接触。

那一年，清真寺里的正位阿訇回老家去了，寺里由我照护着。这一天是星期五，午后我离寺回家休息了。到了下午，寺里有个人急匆匆地来家叫我，说：“阿訇，你快去寺里吧，寺里来了个大官儿……”

解放军的大官儿我虽然没见过，但是要见我也并不害怕。我是寺里正管事的阿訇，在寺里见面，又是在我住惯了的屋里，我怕个啥！我站起来就往寺里走，边走边想，可心里咋也想象不出解放军的大官是什么样子。

一进清真寺，就看见卷棚底下有一，二十个年轻人，都背着短枪，穿着很整齐，衣服都很干净。再往里，我住的北

屋（寺的上房）门前也站着好几个人，也都背着短枪。我不顾这些，只管往里走。一进屋，便见屋里坐着两个人，东边一个，个子很大，很魁梧；西边一个，个子稍低一点。中间是个铁炉子。那时是冬天，冷得很。两个人一样穿戴：紫貂皮帽子，紫貂皮衣领，呢子上衣，但不是军装；脚上穿的棉鞋可厚可厚的。我和他们打过招呼，拉了一把椅子，挨着西边那个同志坐下了。

初次见面，我也不能随便问他们是谁。其实，东边坐的那位就是陈毅将军。我怎么知道的呢？那是全国解放后，我在书店见到了陈毅同志的像和这位大官一模一样，才知道的。

陈毅将军说话瓮声瓮气，但很和气。他问我繁城回民有多少，回民办学校没有，河南哪里回民多等，我都一一回答。后来，他又向我宣讲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他说，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民族自决，国民党的民族政策是大汉族主义。陈毅这么一说，我也同他说了两句。我说：“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我知道，‘民族一律平等，回汉一起相亲’。”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初解放时，街上常常张贴布告、标语，凡是上面有几个字的，我都要走过去看看。这几个字我记得很清楚；是从一张布告上看来的。这次谈话约有一个多钟头。

说完话，他们俩站起来要走。陈将军在前，另一位首长在后，我把他们送到清真寺二门外就站住了。后边的那个人问了我一声：“汉献帝庙在那儿？我朝着庙的方位指了指，说：那几所房子就是。里边有，三绝碑’。”因为繁城出名在，三绝碑’上，我料定他们是来看碑的，所以，没等他们问我，我就先说了。因为他们没有说让我同他们一起去，所以，我站在清真寺二门外目送他们出寺我就回屋休息了。

迟到的噩耗

——怀念舒翔同志

张洛蒂

曹舒翔（1910——1933）原名培芝，字树祥，后改为舒翔。临颍城北周厢附近下坡孙村（今称下坡）人。住城内清真寺街，清真寺北面路西。家有堂屋三间，西屋两间，都是草房，比较简陋。父亲去世早，母女二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后又收养姨母家一个姑娘。名松琴。

舒翔容貌端丽，仪态潇洒，特别是一双明眸，闪耀着她的聪明和智慧。她母亲省吃俭用，供给她在县立女子小学读书。她在学校，刻苦用功，成绩名列全班第一，生活俭朴，不爱修饰，屡次受到学校表扬。

她在小学毕业后，考入信阳女子师范，更加刻苦自励，埋头学习，成绩仍然名列前茅。并积极阅读进步书刊，帮助落后同学，很受同学们爱戴，不久加入了地下共产党组织。

一九二六年秋，我们在周仿溪家第一次见面。当时周任信阳女师国文教师，假期回来，在火神庙街东首路北，住草房两间。那天见面时有舒翔，周的未婚妻胡明玉（信阳女师的学生）和她的女儿影菊（周的前妻生）因为人多，屋里显得比较狭窄。周老师介绍说：“向明是自己人……”，舒翔没等他说完，就说：“今天可见到你啦，常听周老师说”。其实我也早知道她，她也喜欢文学，有时也写些小诗。

有一天，在她家里闲谈，她叫我看她自己刻的图章：一棵小树，上面一个圆圈，里边刻了一个“祥”字，是她原来的字“树祥”。我问她：“你为什么改成‘舒翔’呢？”她说：“我要象一只雄鹰，展开翅膀，在太空翱翔！”接着她笑了笑，又说：“你看这个名子好吗？”

舒翔为人真诚、坦率、热情。她说：“在这封建社会里，女孩子面皮长得白净一点，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我在女小读书时，有两个纨绔子弟，不是在我放学的路上截我，就是托人到我家去提亲，可叫我烦死了，我就是为了冲出这个环境才去信阳女师读书的。”

她还谈到女小的一位男国文老师，四十多岁。有一次找她个别谈作文，最后把作文本交给她时，她发现里面有一封信。说到这里，她拿出来那封信叫我看。信共四页，工楷书写，一丝不苟，内容都是些夸奖景慕的话，最后署名“梦醒”。舒翔说：“这是小学临毕业时给我的信，我没睬他。”说到这里就用火柴把它烧掉了。

一九二六年冬，直系军阀吴佩孚属下的靳云鹗部刘培绪师，在临颍起义，响应北伐，改番号为“保卫军第一师”，成立政治部，组织宣传队。我和本固、耀南、守道与舒翔和她信阳女师的三位女同学，参加了宣传队，展开了宣传工作。舒翔每天和那几位女同学，走街串巷，到居民家中，做妇女工作，筹备组织成立妇女会，非常积极。

一九二七年春二月间，部队在鄢陵和奉军富双英部打了一仗败退下来，临颍被奉军占领，部队退到漯河，政治部撤销，宣传队解散。组织安排本固、耀南、守道和我，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在国共合作期间，毛主席任所

长)学习,舒翔也要求参加学习,因不收女学员,只好作罢。又想到中央军校女兵队去,一时还不能决定。我们同车南下,她和周仿溪以及三个女同学,在信阳下了车,暂到女师去住。我们到武汉考入农所学习。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耀南先被派回临颍。六月间,农所草草结束,我们回临颍时,舒翔已在奉军被击退之后,回到临颍,妇女会已经组织起来了。当时县城里革命气氛非常高涨,到处张贴革命标语:“打倒列强!”

“打倒军阀!”“打倒劣绅!”“拥护三大政策!”“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等,令人耳目一新。当时河南省主席冯玉祥还维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可是已充溢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了。耀南和农所毕业的同学凌邦干、韩树兰等在临颍所办的农运训练班,只办十天,便不得不草草结束。耀南又被调到开封省农会任筹备委员去了。我原来和舒翔一起要去开封看耀南的,由于局势紧张也只好作罢。

几个月来,舒翔家里经常开会,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处已经注意,经常派人到那里走动,暗中侦察我们的动静。

舒翔的身份已经暴露,不能隐蔽下来,继续工作,组织决定她马上离县,到苏联去学习。

在黄叶飘零,西风飒飒的一个秋天的上午,我到了舒翔家里,她的行装简单,已经收拾停当,正准备起程。她对着满眼含泪的妈妈说:“妈妈,不要难过,我很快就要回来的。”转过来又向我说:“有空多来看看,家里的事烦你费心了。”然后我和她及韩文治的妹妹淑玉三人,提着一卷行李来到车站。

淑玉要送她到漯河,她们上车后,舒翔悄声告诉我说”

“时间不会长，再见！”

“再见，祝你一路平安！”我说。

她到漯河拿介绍信，就一个人撇下寡母弱妹踏上了遥远的征程。一个月以后，我接到她自上海的来信，是用铅笔书写的，说她很平安，何时走没定期。还说不要给她回信，说不定一半天就要出发。又停了一个多月，又接到她用铅笔写的来信，说明天要走了，到目的地后给你去信。

一九二八年春天，我已经转入农村地下。一天交通同志交给我舒翔从莫斯科的来信，是在松琴的信中转来的。信是从英文练习簿上拆下来的一页纸，写了两面。字是工楷，一丝不苟，详细叙述了她到那里的情况，她说学校有中国留学生五百多人，目前正在学习俄语，将来每人都要学习一种技术，准备毕业回去，可以有个生活的门路。她不好明说，实际是准备将来工作的掩护，以便隐蔽。还说每个同学都起一个俄国名子，不再用中国的名子了。她又用俄文给我写好了一个信封，叫我务必给她回信。

另外附两张照片，一个是给她妹妹松琴的，短发齐耳，面容丰润；另一张给我的，戴着鸭舌帽，脸部右面因帽舌影遮住，只看出左面的一部分，显露出愉快兴奋的神情。

我给她写了回信，连那张她给松琴的照片，交给交通同志，带到城里分别转交、投邮。后来一直没有接到她的来信，大概由于河南开始清党，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这封信怕是寄不出去了。

后来听说一九三〇年前后，她和一个学医的同学回到广州某地，以行医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久遇难，道路传闻，不知确否。

她的信和照片我一直在保存着。一九四四年，日寇侵占我县前夕，把它和一大批书籍一起烧掉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县党史办派人多次调查访问，又派人到广州探寻，始终没有确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位一九二七年活跃在临颖县革命队伍中的一位女共产党员，虽然没有留下她轰轰烈烈的事迹，但她和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一样，都在新中国艰难的道路上，留下他们的足印，不愧为炎黄子孙，不愧为中华优秀儿女。

舒翔，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你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每年清明节给先烈扫墓之际，南望云天，总不禁潸然泪下。

今年五月二十一日，县党史办阎殿卿同志，交给我一份关于曹舒翔同志的资料。内容如下：

“曹舒翔被错杀的资料

——《红色中华报》1931年

曹舒翔，女，23岁，未婚，中农，师范，到苏联三年，在莫斯科。30年回国，任红军总医院第四分院政委。31年青反中被捕。32年3月被判监禁二年，33年3月被当作AB团，杀于江西瑞金。

此资料是根据省委党史办工作人员路海江同志讲述，本人记录。准确及详细资料，在《红色中华报》上，亦可访卫生部。

阎殿卿 87，5，21。”

我读了这迟到的噩耗，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一只刚刚展翅的雏鹰，就这样的夭折了！舒翔，记得我们临别时，相约铭记的誓言：“我们是炎黄子孙，中华儿女，誓雪祖国

母亲的耻辱，使她美丽、富强、幸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现在这冤抑已申，宿愿已偿。祖国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的屈辱已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及英明措施，祖国已踏上了强国之林。现在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大道上勇往迈进，前途阳光灿烂，一片锦绣！安息吧，舒翔！

1987，8，23，临颖一高。

共产主义思想在临颖的传播

阎殿卿

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开始，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步解体，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封建统治者投靠帝国主义，实行腐朽反动的统治，使广大人民过着极端贫困的毫无民主权力的悲惨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几十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斗争都失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进步的思想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直到一九一九年在北京爆发伟大的五四运动——这是以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培养，指导和影响下的，以学生为主的反帝爱国运动，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更高潮。其影响之广大，遍及全国，在知识界中尤为深刻。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投入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这股革命洪流汹涌澎湃，浪击全国，自然也会冲击到临颖县腐朽的封建主义池沼，涤荡，冲刷着这里的污泥浊水，把民主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带到临颖，并在临颖扎根生长，开花结果。

共产主义思想在临颖的传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奠基阶段、初级阶段和深入发展阶段。从时限上讲，上限应在一九二零年临颖县蚕校实行救国教育失败后起到一九二七年元月第一批共产党员在蚕校产生止。其传播方式，主要由一些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借助学校，同学校的智育相结合，把共产主义思想同民主革命思想带入课堂，使共产主义思想逐步在临颖传播开去。

一九二零年前后的临颖，县城内有四所学校：乙种蚕校（后改办为甲种蚕校）、师范学校、高级小学和女子小学。这是受当时民主革命思想影响最早最深的学校。特别是蚕校，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以致成为临颖县早期革命者的摇篮。

蚕校校长田清波（字鉴海），临颖县阳坞庙人，大学毕业，革命思想浓厚，品德情操高尚，刚直不阿，疾恶为仇，时人称誉他是一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敢斗社会邪恶”的正派之人。他对当时黑暗社会不满，敢于大胆抨击时弊，毫无顾忌，有人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田疯子”。

田清波思想进步，颇有才识，早具大志，欲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他曾在蚕校开办“阜民丝厂”，大兴实业救国之举，自划动手设计制造缫丝新机械，大兴改革创新之风，想以此振作国民，复苏经济，并期发扬光大，确也曾红火一时。但由于日货的冲击，很快失败了。这件事使他觉悟到，“实业救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回过头来，锐意办学，下决心培养有真才实学的革命人材。他所聘请的教师，许多都是大学毕业生，如西平的轩光宇、洛阳的乔冰士、舞阳的李子纯等，都是他大学的同学。他还特别注意选

聘进步教员到校任教。一九二一年，全国闻名的进步诗人、文学家徐玉诺先生很快被他聘请到校来。

田清波决定选聘进步教师培养革命人才，虽然没有明确的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和培养共产主义战士的指导思想，但他却在客观上为民主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在临颖传播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他这一主张，实则是使共产主义思想较早地传入临颖的关键，客观上为后来用共产主义思想造就革命人才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徐玉诺进校任教，使学校增添了崭新的教学内容，他把国文教学增添了相当多的政治色彩和政治内容。

徐玉诺先生民主革命思想浓郁，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反动与腐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经常地、随时随地地以各种方式向学生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并把自己的文艺作品向学生介绍。不仅如此，徐先生还向学生讲述一些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提倡阅读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论的书籍。学生们在徐先生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前新鲜的革命词语和故事，这对于思想懵懂的青年学生来说，徐先生把他们带进了一个新的境界和思想领域，使学生茅塞顿开，耳目一新，大长了见识，思想也随之焕然一新。

徐玉诺先生富有一个幽默、浪漫的诗人气质和平易近人的性格。他常常和学生打成一片，善于把教育寓于诙谐滑稽的嘻戏之中，使教育颇带戏剧性，生动活泼，以加深教育效果。有一次，一个学生的兄长牵着一头毛驴给弟弟送口粮，徐先生灵感顿生，他要给学生表演一出《傻子骑驴》。只见他骑上驴背，肩扛一袋粮食，张大嘴巴，用下巴颏撑紧草帽

带，挽着长长的缰绳骑在驴的后跨上……在操场上做起戏来，逗得学生前仰后合，捧腹大笑。

徐先生的表演貌似玩笑，其实这是徐先生独具一格的教育方法。表演的本身就是一种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充分表现——他一反社会常态，全然没有师道尊严。平时，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给学生表演个“节目”。学生们也常和他开些戏剧性的玩笑，他很随和，也会随即进入角色，和学生们一起做起“戏”来。类似这样的表演，会给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还有一次，一个学生把他祖父精心喂养的百灵鸟带到学校，鸟笼挂在图书馆外边的梓树上。百灵啾唧，甚是悦耳，引来不少围观的学生。徐先生看到这种场面，煞有介事的，皱眉头，对学生说：“它的叫声并不悦耳，它不是在唱，而是在哭！试想，它在树林中该有多么自由啊，如今关在笼子里，象个囚犯。应当恢复它的自由！”大家一致赞同。这时学生打开鸟笼百灵一跃，悠然消失在蓝天之中。学生们热闹一阵后，很快沉寂下来了，在徐先生的诱导下，大家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何尝不就是个大牢笼！在反动腐朽的统治之下，人民哪有自由？只有打碎牢笼，人民才能得到自由。徐先生就是这样启发学生的革命觉悟的。

徐先生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思想更充分的表现，是在他写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上。他的《将来的花园》、《永在的真实》、《为什么》、《小诗》、《翻过山来》、《一双破鞋》等散文都给学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和鲜明的启迪。有的学生如张耀南也效仿他的笔法写出强烈地反封建的诗作，发表在当时有名的《小说月报》上。

一九二三年徐先生离开蚕校，后来几经辗转，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并兼任《四明日报》副刊编辑，可他还惦记着蚕校学生，常写信来约学生为报纸撰稿，并教导学生和鼓励学生走在革命的道路上走下去。在他的教育下，蚕校的学生普遍受民主革命思想的感染，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倾向革命的青年学生。

徐玉诺先生在甲种蚕校任教两年多的时间里，以极高的热情，最大的努力向学生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宣扬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改变了固存在许多青年学生头脑中陈腐的思想观念，使学生开始自觉地接受和追求新事物、新思想。这种新的追求和接受能力会使学生很自然地接受民主革命思想自然地过渡到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从而成功地开辟和铺垫了共产主义思想在临颖传播的道路。

徐玉诺先生走后的一九二四年，田清波校长又从杞县请进一位叫叶善枝（字抗秋）的国文教员。叶善枝是河北玉田县人，三十六七岁，五四运动前后曾在上海。他很熟悉上海革命文艺界的活动，经常给学生讲上海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团体和郭沫若的事迹，讲述马克思、列宁的故事，讲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详细地介绍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情况。

叶善枝的政治观点十分明朗，他非常突出地在学校内讲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主张“以俄为师”，走俄国人武装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道路，打倒封建，建设共产主义。他的住室里，挂起列宁的大幅画像，还写上充满革命情调的对联。他还把许多进步的文学杂志送给学生阅读。他的思想及行为给学生的影响相当深。处在消息闭塞、封建思想禁锢下

的临颖县城的青年学生，对这些书刊杂志有着极大的兴趣，爱不释手，孜孜以读之，从中受益非浅。

叶老师并不满足于向学生言传口授。而且还很重视学生的社会活动，积极引导走五四运动中验证了的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把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宣传到民众中去。其中最大的、宣传效果最好的、也是最能锻炼学生的一次活动，是他组织学生演出有强烈反封建礼教意识的简装话剧《孔雀东南飞》，一下轰动了全城，万人空巷，到蚕校操场观看演出。

这次演出，是青年学生第一次直接向封建礼教发起正面的猛烈进攻。话剧《孔雀东南飞》象一发反封建思想的炮弹，从甲种蚕校发出去，在封建主义的社会土壤上爆炸了。学生们通过戏剧的形式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展开无情揭露、控诉和猛烈地批判，不仅教育了群众，也使学生自己受到教育和锻炼，进一步激发了他们革命的热情。作为民主革命活动的一次演习，它从此把进步的青年学生与人民群众在思想上沟通了联系，扩大了进步学生和社会上的影响，成功地铺垫了学生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造成了一个革命活动的良好开端，为以后学生参加浩大的农民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看到学生们高涨的革命热情，叶老师很高兴。他又进一步启发学生说：“临颖的封建势力密封得象铁桶一般，我们一定要把它戳个大窟窿，透过一缕阳光和一丝新鲜空气。”叶善枝的话，正是他“以俄为师”的基本思想的表现，也是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走推翻旧世界的道路。此时蚕校的学生，在经受不断的革命思想教育之后，共产主义觉悟日渐提高，用革命的观点观察周围社会，学生们真正看透了这个社